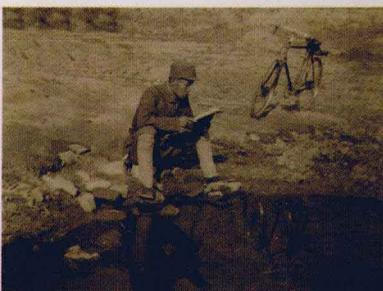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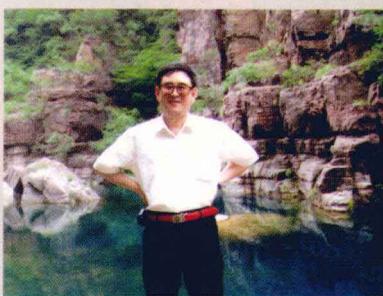




# 张映辰 生瑞缘

张映辰 著



# 序

张夙起

我以为，诸多文学样式，作好哪个也难，而作好报告文学则更难。由是，我便望而却步而很少涉猎；由是，我便佩服张映辰先生的勇气。

报告文学难驾驭，是因为它既要有新闻性，又要调动文学手法，讲究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事件的集中描述；既要如报告一样的真实，又要开掘人物内心世界蕴含的深切感情，表现人物鲜明生动的个性；既要精心设计情节，又要有人物的细节描写；既要叙事，又要在叙事中议论、抒情，并使之融为一体，引发出与众不同而又发人深省的见地；既要熟悉生活，以生活原型为基础，又要展开想象的翅膀，虚实结合，行文疏密得当，亦收亦放，亦远亦近，放开去如野马奔腾，收拢时密不插针。报告文学，难亦哉！映辰先生敢为之，实在难得。只有跟文学打过交道，尤其是跟报告文学打过交道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惨淡经营的滋味儿。得知先生把近年创作的文章收集起来，编辑成《群星璀璨》报告文学集，高兴之余，心里不由赞叹起来。啊，映辰先生，不易啊，不易！

先生将文稿郑重交给我，嘱我作序。啊，难得先生看重！可对报告文学知之甚少，囊中羞涩，唉，惭愧！

作报告文学难，而为报告文学集作序更难。站在门外看门内，自然云山雾罩，自然不得要领，内心不因此生出压力而踌躇才怪！虽深知难当此任，但找了些理由却推辞不掉，只好把先生的稿子，不，应当说，把先生的看重忐忑不安地捧回来了。

我这个人不争气，历来如此。不怕人骂，越骂就越拗出一股近乎野性的牛劲；就怕人敬，人一敬，就忘乎所以而不知东西南北了，进而就摸不着后脑勺子了，软了。

认真拜读了先生的大作，感觉先生气魄很大，敢“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群星璀璨》的题材非常广泛，涵盖了建筑、旅游、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而且时间跨度也很大，既有在延庆战斗过的姜国亭和冯占吉等焕发青春的老革命，又有像唐文杰、赵凤利一样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新人物；既有经济战线创造奇迹的弄潮儿，又有忠实于文化事业而多才多艺的史长江、教育界的优秀教师李青山、卫生界群众工作细密的基层干部李秀枝等出色人物，还有柳沟、里炮、大榆树等单位的群体形象。一种行业有一种行业的特点，有一种行业的知识。短时间深入那么多领域，熟悉那么多行业，足见先生态度之虚心、领悟之快、知识之广博。

报告文学的功夫见于文字之外。形诸文字的东西总有限制，总可以计量，但前期的工作却无法用量化的标准计算。首先是采访，那要下真功夫的。如今生活节奏日渐快捷，约定采访对象都难，何况有的采访需要多次才能完成。其次是采访后进行的艺术加工。这不但需要对采访的材料进行梳

理、剪裁，还需要进行缜密的构思。写作虽然辛苦，但较之采访和艺术构思却显得容易些了。先生年过7旬，那么多人物，那么多单位，反复奔波的辛苦劳碌可想而知了。没有一种责任感，没有一种被人物、事件感染后的激动，没有这种激动后引发的强烈创作愿望，是绝对完不成那么多采访和写作的。

先生祖居永宁，是地地道道的延庆人。1958年就读于张家口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安新县中学任教，1964年调回了魂牵梦绕的家乡延庆。几十年，先生把青春、才华、智慧都献给了家乡的故土，把心灵融入了家乡的故土。故土延庆的发展变化时时撞击和震动了先生的心灵，于是，他便用心灵开掘这种变化的蕴含，发现这种变化中涌现出人物或睿智、或刚毅、或果断、或幽默、或开朗、或平易可亲等性格的光彩。

先生把精力集中于延庆人和发生在延庆事件上。《里炮村散记》、《凤凰城见闻》、《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颗新星》等描述了里炮、柳沟和大榆树镇改革开放30年发生的巨大变化；《龙聚山庄的“一把手”》，记述了赵凤利不畏艰难，建设“既有田园风光，又有时代气息”的龙聚山庄，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过程，刻画了一位全国劳模的形象；《妫河之子唐文杰》则记载了主人公抓住商机，领导一个建筑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在延庆战斗过的英雄，同样引起了先生的关注。其中，冯占吉、宋德连等人的故事闪亮了人物的勇敢、智慧和机警个性特征，文字更生动，也更好看。

《群星璀璨》的人物和事件正如辉映先生的故土的群星，璀璨夺目。愿大家读读这本报告文学集。愿这些人物给人以

鼓舞，给人以启迪，给人以一种精神力量，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更愿映辰先生一如既往，“垂首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身体本无价，何止千金？先生，要珍惜！同时，又要不坠万里雄心，在驰骋中挥洒笔墨，写出更多更好、见地更独特、境界更深邃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飨更多读者的渴求。

2008年11月2日深夜于清味斋

# 目 录

## 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拜访八十八岁姜国亭先生记 ..... 1

天池翁——冯占吉 ..... 19

冯占吉抗日斗争片段 ..... 24

青年时代的宋德连 ..... 37

## 自古英雄出少年

——杨鸿儒同志回忆录 ..... 45

## 龙聚山庄的“一把手”

——记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赵凤利 57

妫河之子——唐文杰 ..... 69

## 多才多艺灿烂人生

——记延庆县文化工作者史长江先生 ..... 86

## 凤凰城见闻

——柳沟之行漫记 ..... 102

## 育桃李香飘长城内外

——记北京市优秀教师、育新楼经理李青山 ..... 121

里炮村散记 ..... 135

里炮村散记（续） ..... 141

## 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颗新星

——延庆大榆树镇采访纪实 ..... 147

## 杏林花开正芬芳

——记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李秀枝 ..... 163

# 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拜访八十八岁姜国亭先生记

今年5月15日，我去《妫川》编辑部找主编史长江先生研究稿件。他问我认识不认识年已八十八岁的姜国亭老先生，我忙说认识认识。姜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是延庆县县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政委，在那个时期，一说姜政委，那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我认识他是60多年前，在永宁召开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上。那时他是24岁的县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政委，我是9岁的儿童团团长。他身着八路军戎装，斜挎盒子枪，身材不高，却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他讲话充满激情，声音洪亮，极具吸引力。从那时起，他就是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此后的60多年间，天各一方，未能相见，甚是遗憾。姜老先生的爱人赵凤先家和我家是邻居，关系甚密。在永宁小学与凤先姐分别后只通过一次电话，相约叙旧，也未能实现，她就永远地走了。每想起她，心中总是空落落的。长江先生见我伤感，忙说：现在姜政委身体很好。他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建国后，听从党的召唤，走南闯北，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计名利与得失，不畏艰难与困苦，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离休后余热不减当年，70岁学书法，80岁学音乐，不但自娱，也与大家共乐。

今年六七月间他要回延庆看望老战友、老同事，城镇乡村走走转转，了解一些家乡的变化和发展。你写写姜老吧，我欣然答应了。他回来后我俩就结伴拜访了他老人家。7月9日上午8点半，我怀着与亲人别后重逢的喜悦心情同长江先生一起来到了孙庄子姜老的“绿色家园”。院内一排北房坐落在绿树花丛之中，幽静而雅致，清新而秀美，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姜老坐在正房走廊的玻璃窗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书，听见我们进院了，健步迎了出来，亲切地和我们握手，他握手的力度很强，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们手拉手进了屋，在一普通长方木桌前相对而坐。桌上三杯沏好的铁观音芳香四溢。姜老上身仅穿一件二道梁的纯棉背心，下着一条灰色便裤，脚穿一双老式样黑布鞋，自然简朴，宽松舒适。老人家腰不弯，背不驼，坐如钟，站如松，身子骨真是硬朗。耳不聋，眼虽花，但戴上眼镜视力如常，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强。姜老方方正正的脸上皱纹不多，红光满面，岁月的流逝使他头上有了些白发，宽大的前额展示着他的聪明与智慧。过唇的双耳告诉人们他福寿双全。从他那真诚的微笑和自然流露出的内心喜悦中看到的是慈祥和善良，自信与坚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丁点儿当过官的痕迹，这次回延庆也早就和县里面打了招呼，一不要地方官陪同，二不用县里安排车，三不安排宾馆。

看到姜老的身体如此康健，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12个方面的采访提纲全部对他讲了。姜老认真听完后笑道：我就按你的要求说吧。我是1921年2月23日生在咱们县北张庄村一个农民家庭。本不姓姜而姓周，叫周德先，参加革命后为了安全，随母姓姜改名国亭，父亲叫周万金，是农民兼小商贩。因天灾和祖父母、伯父相继去世，家里就父母和我三个人，

为了生活卖了果树和部分土地后变成了贫农。又因遭米粮屯一个吴姓地主的诬陷，我父亲两次入狱，为了弄个清白卖了仅有的几亩好地，借了高利贷，虽然官司打赢了，家里变得一贫如洗，生活极为贫困。9岁时母亲因血痨没钱医治离开了我和父亲。我帮父亲干农活之余，在四个冬季读私塾，加起来也就是一年的时间，读过《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三言、五言、七言杂字，《大学》、《中庸》、《论语》等，珠算是自学的。说到这里，姜老竟给我们背起了整段整段过去读过的书和妙趣横生的珠算口诀题，令我惊叹不已。老人家抿了口茶接着说下去。我从小爱学习，看了不少书，《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施公案》、《包公案》、《西游记》和《水浒传》等都看过。对绕口令、歇后语、有趣的寓言故事等遇到了就学就背。现在背书法、背乐谱、背八荣八耻等。我这个人学习较真儿，对生僻字词都查字典，现在能认5000多字。

从13岁开始我就自谋生路，在村里学校教过书，当过勤杂工。为了替父还债到永宁城里崔二顺杂货店打杂，卖货、算账、记账、挑水扫地，东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16岁至19岁在村里写账，当记账员挣钱维持生活。1940年春夏之间，八路军干部开辟了昌（平）延（庆）县第六区，到我们村开展工作，让我当抗日两面政权的副村长。这年八月区委书记田梦熊和刘景泉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本村作抗日宣传、征粮、征军鞋等工作，组织群众对本村伪甲长搞反贪污的斗争，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同年11月，去昌延县委党员训练班学习一个星期。回来后被提为区委的小区执委。1941年4月被提到区里任中共昌延县六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田梦熊同志牺牲后，同年10月被提

为区委书记。此后各大乡都有了日伪武装，敌人集中兵力，频繁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凡是进山要道敌人都设了据点。七区委区委书记傅常英投降日寇，出卖了全区的干部，党员也不敢见党的干部。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里，我们坚持了抗日斗争，坚持了在平原的根据地。1942年至1943年，因十区干部受损失，县委决定将六区、十区合为一个区委会，我任联合区区委书记。这一年是抗日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了在我华北地区掠夺人力物力资源，妄图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加上政治上引诱欺骗，群众抗日情绪暂时转入低潮，有些不坚定的干部叛变投敌，帮敌人抓捕我区干部。有的党员和干部消极了，既逃避敌人，也不敢接近我们了。我多次到常家营村去，找不到干部也找不到党员。一天深夜我到敌人据点村旧县西关一个姓高的党员家里，他是一个很贫苦的老长工，对我还信任，就悄悄地对我说了村里的情况。旧县、古城、下郝庄、常家营等村的党组织全垮掉了。我们深夜到一些村工作，吃饭都很困难，真有点电影《五更寒》里描写的味道。1943年春节我们在赤城县野猪窝过的，吃的玉米面冻萝卜馅饺子，大家也很乐观。

离我们北张庄村不远有个三里庄村。这个村党支部是抗日斗争的堡垒，它是昌延县六区我党开辟较早的村庄，是一个有180多户的大村。我抗日工作人员于1940年春来到这里，经过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很快就建立了抗日两面政权。组建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民兵组织。建立党组织后发展也很快，到1941年，村里已有十多名党员。群众发动得也很好，近千口人齐心抗日，敌人没办法从这个村找到一个可利用的人，就连伪大乡强行要的谍

报员也是我们派的共产党员，名义上给敌人送“情报”，实际上是探听敌情。这个村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合理负担等比其他村先行一步。从这个村总结了经验指导周围村的工作。宣传组织群众时，工作做得细。党支部制定的方案通过农会、妇会、青会会员分头发动群众，逐户逐人进行工作，谁家老头开明，谁家老婆“顽固”，采取“兵对兵”、“将对将”的办法作思想工作，效果很好。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有了靠山，抗日一定能胜利。三里庄有位老农叫陈贵荣，他老伴叫闫大焕，都是近 50 岁的人，我们一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叫他俩大爷大娘。老两口抗日坚决，工作积极，家住东土坎上，院外有条大土沟，跑敌情很便利。我们区委会的干部常住他家，同他们老两口有深厚的感情，时间长了不见面还真的十分想念。他们家里养的鸡下了蛋就攒起来卖了钱给我们打灯油，我们夜里在他家研究工作，陈大爷站岗放哨，闫大娘烧水做饭，半宿半宿的不能睡觉。从 1941 年到抗战胜利说不清他老两口辛苦了多少个夜晚。陈大爷当我们义务交通员，深夜送县干部到南山。闫大娘的闺女家在古城村，该村是敌据点，有个伪军的头头叫陈起，他们有亲戚关系，为了争取陈不死心踏地当汉奸，我们写了劝降信，闫大娘藏在包脚布里给送去，不顾个人安危。有了这么好的群众，抗日怎能不胜利。1943 年夏天，旧县和白草洼两个据点的伪军换防，三里庄村地处两个据点的中间。有两个特务，一个叫高三是王木营村人，另一个是东北人，他俩利用伪军换防的机会，到三里庄找人给米粮屯、大柏老等村送条子要钱，他俩在伪甲长家吃饭坐等，我们得到消息，区干部和村里的民兵化装成伪甲公所要钱粮的人，手拿算盘、斗、口袋进了伪甲长家，一进门碰上伪甲长的儿媳

在外屋炒菜，见了我们叫了声“娘唉”，声小特务没听见。进了里屋见特务正在喝酒，他俩见我们是甲公所的打扮也没理我们，我们齐喊一声“不许动”，三个人抓一个把他俩抓走了。从村东黄土沟上了北山，因怕敌人发现，没用枪打，用石头结果了他们的狗命。这时我们从山上往下看，两个据点的伪军正交叉走过三里庄村。

1942年，日寇集中了4000余人，伪军6000余人，对我平北地区进行长期扫荡，大小战斗414次。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我军民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区村干部夜宿山沟、石洞、庄稼地，衣潮被湿，生活异常艰苦，可是大家为了赶走日本强盗建立新中国不怕艰苦，都很乐观。冬春季节没了“青纱帐”，就利用村外边的土坎、村内的碾子底下、炕洞挖隐蔽洞。团山、盆窑等村挖洞比较多，而且挖得很巧妙，敌人很难发现。团山村有的隐蔽洞挖在坟地里，先在适当的地方挖个坑，从坑边挖一出入口，坑里铺上草，上边用木头和秫秸封顶，再用土堆成坟丘，中间用秫秸秆绑个把作通气孔，上面插上白纸幡，出入口盖上一块石板。到夜晚，区村干部进“坟”休息、开会，次日早晨，村子放好岗哨，叫“坟”里人回村，用这办法坚持斗争很久。盆窑村是旧县伪大乡的附属村，两地相距只有二里。由于村党支部坚强，工作深入，全村40余户人家，200多口人齐心抗日，县和区干部常到这个村住。支部书记郭存田同志家中的隐蔽洞挖在碾盘底下，出口通到烧盆的窑内，用盆盖着。1942年春天的一个晴朗日子里，我和县政府秘书张子丰正在村边小河洗衣服，郭存田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永宁伪满洲军从团山向盆窑来了，快要进村了。怎么办？跑吧，北边是敌据点，东边是大山坡，西边是开阔地，敌人从南边来，郭存田同志说：快到我家进

洞吧！于是，我们往南跑，敌人往北来，我们刚进洞，敌人也进了村。一个营的伪满洲军住下要吃饭，郭存田同志家也住上了。敌人说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敌人老不走，时间过得特别慢，等呀等，真着急，直到听见郭存田同志喊；敌人走了，出来吃饭吧。我俩才出来松了口气，吃了一顿白面烙饼。

从1943年秋后形势逐渐好转，通过我们艰苦的工作，党组织的巩固和建设也有了较快地发展，较前更纯洁了，遭破坏的党组织也恢复了。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减租减息、支援前线、增加工资、合理负担等工作也都顺利开展起来了。

在抗日战争中瓦解敌伪军是一项重要工作。对日军工作有反战同盟支部，对朝鲜军有朝鲜义勇军，对伪满洲军和当地伪军政人员也都有专人负责并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关系进行工作。针对不同对象，我们制定了各种政策。对日军是揭露其军国主义侵略性质，激起其厌战情绪，对伪满洲军要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使其反战，我们就在山石上写标语：“满洲军兄弟们！枪弹进膛，细细思量，子弹射出，何人受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经过我们的工作，有的敌伪士兵在扫荡时枪往天上打，有的还给我们留下子弹。伪旧县大乡长叫苏广明，他是旧县人。我军十团团长王亢率三个连的部队进驻旧县村，在1943年冬一个天晴月朗的夜晚，部队围着据点正步走，喊着一二三四，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小炮、机枪架上，对据点里的伪军政人员进行宣传，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我党对伪军政人员的政策，让他们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要给自己留后路，不许欺压老百姓，土围子上的伪军政人员悄悄地听着。我们喊话要苏广明出来看看我们的部队能不能打下这个据点。过去我们没少争取他，他了解我们

的政策，再加上苏广明惧怕十团的威力，不敢开城门怕我们冲进去，就坐在大筐里从墙上顺下来。听了我们训话后，保证不再欺压百姓，尽自己的力量应付日本人。永宁镇伪镇长韩玉龙外号韩半城，有钱有势，日本侵占永宁后，被委任为永宁镇长。我们了解他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有争取的可能。北张庄村的田俊喜是晚清的武秀才，在当地很有名望，就请他出面争取韩，经多次工作，韩玉龙表示愿意利用其身份为抗日救国做贡献。为了表示加入抗日救国会的意愿，交给我们一支手枪算作会费，常向我们提供情报。最突出的一次是把伪延庆县政府贯彻执行伪蒙疆“第五次施政跃进”计划送给了我们，使地委、县委及时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计划。白草洼村的敌据点设在村后的小山上，中间有一个大炮楼，南北各设一个小炮楼，周围有高墙，里边驻有 60 多伪军，地形条件很不利攻打，但离县城较远，联络不方便，伪军的吃喝全得从山下往上运。在白草洼我们早有群众基础，该村伪甲长给伪军送我们的传单，村里爆炸组在伪军通行的路上埋了地雷进行封锁，就连能给敌人据点“报信”的几条狗也被我们杀掉了。1944 年初，我十团和县大队进驻该村，通过晋察冀边区参议张华亭与伪军的关系给伪军写信，要他们投降。伪军们日夜提心吊胆，愿意投降。张华亭上山同伪军谈判，愿当八路军的留下，愿回家的可以走。伪军胡乱打了一阵枪，扔些手榴弹，烧了炮楼，制造攻打的假象，免得伪军回家后受害。伪军下山交了武器，吃了一顿大米饭、白菜炖肉就回家了。从此，我军出入此山的通道畅通无阻。1944 年 3 月 1 日夜里，团长王亢和副政委曾威率领三个连和县基干队进驻距县城十里的双营村，伺机消灭延庆伪军。2 日上午，敌人发现县城东北大道上没人来赶集，判断双营村驻了八路军。

午，我们在双营城墙西南角上，用望远镜看到县城东校场有敌人活动。不一会，炮声响起来，炮弹有的落在双营城内，大部分落在双营北城外。我们分析，敌人很可能出县城到双营来，因为敌人不会让八路军待在眼皮底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寇兵力不足，县城里没有日本军队，只有伪警察和日本指导官，有战斗能力的也就百余人。我们基干队和团部后勤人员假撤退，引诱敌人，王亢团长带两个连埋伏在双营城西的蒋家堡村，机枪阵地设在这个村的土墩上。曾副政委带一个连掩护和增援，重机枪阵地设在双营西城头上。敌人经米家堡向蒋家堡蠕动，叛徒王承起带队，日本指导官田代督战。当敌人进入我军埋伏阵地，我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开火，经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伪军全部被歼，打死田代，俘敌 70 余人，获大批武器，王承起化装逃走。我军进驻黄柏寺，各村群众杀猪宰羊慰问指战员。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延庆伪军不敢再出来搜索和扫荡，我抗日军民情绪高涨，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发展，出现了抗战胜利前夕的大好局面。

我打了六年日本鬼子，日寇投降后又打了三年国民党。1946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2 日，延庆县党政军民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独立第五旅反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以延庆县城为主线打了一场胜利的保卫战。战斗中共歼灭敌军八百余人。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暂时撤离张家口，独立第五旅战略转移待机歼敌，延庆县级党政机关也随即撤往北山。延庆县共有七个区二百四十一个村，国民军控制了五个区一百九十八个村。我们只剩下南山的六区和北山的五区、四区的四个村，总共四十三个村没被敌人控制。上级党组织根据形势的需要，调整了县里班子，我任县委书记、郑

英年任副书记。宣传部长王志宏、组织部长靳子川、民运部长崔明、敌工部长唐思源、县长张浩昌、公安局长丁一农为委员。新县委组成后在赤城县白塔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分析了形势，坚定了坚持斗争的信心，确定了工作方针：我们必须依靠南北山老根据地，在川区以武装工作队为主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县大队相机打击小股还乡团，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了适应环境，县委分成两个班子以南北山为基地，面向川区独立作战。北山由我、张浩昌、王志宏、丁一农负责，南山由郑英年、崔明、唐思源、靳子川、徐泽清负责。这种局面一直坚持到平津战役前夕。到 1948 年春，我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战场上已转入全面进攻。永宁镇距县城 40 里，城内有敌保警大队 400 多人，城西关有各大乡队及伪行政人员 300 多人。敌人怕我攻城，已将三个城门用沙土袋堵死，只留西门出入。我平北军分区决定拿下这个据点，歼灭驻守之敌。4 月 22 日由军分区司令员唐家礼统一指挥冀热察辽第 26 团及延庆、怀柔、四海三个县大队包围了永宁。县区干部组织了担架队和后勤工作队。为了迷惑敌人，在日落之前，我军全部及担架队等支前人员向东北方向“撤去”，待到夜深人静后迅速返回包围了永宁城。指挥部和 26 团在北关主攻，延庆县大队两个连攻打西关大乡队，另一个连在永宁延庆之间的香村营以西准备阻击延庆增援之敌。四海县大队攻东门并歼逃敌，怀柔县大队攻南门和歼逃敌。南城佯攻，吸引敌兵力在南城集中。北门用爆破炸开，用两张高桌，脚对脚绑在一起，底下安上车轮，中间装上炸药，上面用多层浸湿了的棉被盖好，以防被敌炮火引爆。二十三日零点攻击开始，先用轻重机枪猛烈火力攻打城头，使敌注意力集中到我射击阵地，乘机将炸药车推到城门下引

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北城门上半部被炸开，城头上敌军被震晕了。我 26 团部队趁机冲入城内，很快占领了城中心的玉皇阁控制了制高点。延庆县大队迅猛攻打伪大乡队，全歼了敌人攻入西门。26 团及怀柔、四海县大队齐向城内敌人猛攻，激战到二十三日上午，敌人退到东南角拼死抵抗。中午 12 点，我们发起总攻，经过一小时的激战，伪警察大队长率残敌跳城逃跑，结果死的死，伤的伤，其余全部被俘，下午两点结束战斗。这次战斗共俘伪保警大队长以下 545 人，击毙 65 人，缴获各种枪支 315 支（挺），伪镇长吴涛清被活捉，彻底歼灭了延庆县残余的还乡团。在战斗中我军伤亡 40 余人，县大队二连长赵本同志光荣牺牲。1948 年 11 月国民党傅作义的主力 35 军驻沙城，16 军驻康庄，我东北大军于 12 月 8 日来到永宁。我县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支前工作，通过三条运输线运输物资和伤员。12 月 10 日康庄守敌被全歼。平津战役之后，有 12 万人口的延庆县，供应粮食 180 余万斤，战柴约 575 万公斤，畜用干草 59 万斤，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证。男女老少在支前中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延庆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有 1500 多位烈士刻上了纪念碑。他们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到十一点半多，姜老一口气已讲了三个小时了，他始终端端正正坐在硬木椅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倦意，充沛的精力依然如故。中午，姜老执意要请我们去井庄镇柳沟村的红杏山庄品尝全驴宴，盛情难却，就客随主便。饭后小睡片刻，姜老又端坐在椅子上继续上午没讲完的故事。我注视姜老的神态，他似乎还在回忆战争年代的人和事，他感慨地说：多少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我是幸存者，忘不了他